

西汉的商贾和商贾政策

李成良

一个幽灵——商贾势力在公元前三世纪末到公元一世纪初的中国大地回荡，它神奇的魔力影响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从经济生活到政治、军事、思想文化诸方面无不显示出它的顽强存在。西汉王朝为之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对西汉的封建经济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些都是我们研究西汉历史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

强大的商贾势力

商业活动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产生的，其发展程度是社会经济发展的晴雨表。我国古代文献中很早就有“祝融作市”^①、“日中为市”^②的记载。《说文解字》在释“贾”字曰：“市也”，“一曰坐列卖售也。”颜师古曰：“行卖曰商，坐卖曰贾，若今市中卖物行也。”^③西汉时期的商贾承继了春秋、战国的传统而发展，在《史记》和《汉书》中通称为“货殖家”，《史》、《汉》皆为之专门列传，其势可知也。据实而考，其类别可分为三。

其一是比较纯粹的商人。主要活动在流通领域，即所谓“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乐，趋事如猛兽鸷鸟之发”，或“周游天下”、或“坐列贩卖”^④货无不通的商贾。

其二是兼营工商业、畜牧业、农业的货殖家。这类商贾拥有童仆成百上千，经营矿冶、煮盐、畜牧业、高利贷，“武断乡曲，位拟人君”，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地方势力网络。

其三则是以强大的经济势力为基础，竭力参预政治，时时企望在政治上表现自己。这类商贾以吕不韦为榜样，“以财养士”、“交通王侯，以利相倾”，渐渐地参预封建政治核心，在封建政权混入了这样一个复杂的因素，故时人惊呼：“吏道杂矣”。^⑤

这样，西汉时期的商贾即成为一种强大的社会势力，商贾活动就象一块墨渍渐渐地侵蚀在“纯洁”的封建社会的各个方面。

汉初，“海内为一，货无不通。”^⑥经过休养生息的恢复时期，社会生产有了长足的进步。“四方辐凑，并至而会”，全国已拥有十几个大的经济区和商业都会，并且有了海外贸易。商贾势力经过强秦的短期遏制象狂潮一样奔腾泛滥起来，使人们蹶足侧目。

蜀卓氏，用铁冶富。“致之临邛，大烹，即铁山鼓铸，运筹算，贾滇、蜀民，富至童八百人，田池射猎拟于人君。”^⑦

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结民，富埒卓氏。”^⑧

成、哀间，成都罗衰“訾至巨万”，“赊贷郡国，人莫敢欺。擅盐井之利，期年所得自倍，遂殖其货。”^⑨

南阳孔氏，“大鼓铸，规陂田，连骑游诸侯，因通商贾之利，有游闲公子之名。……家致数千金。故南阳行贾尽法孔氏之雍容。”^⑩

鲁人丙氏，“以铁冶起，富至巨万。”^⑪

齐人刀闲，“逐渔盐商贾之利”，“起数千万”。^⑫

成帝，哀帝年间，“临淄姓伟訾数五千万。”^⑬

成、哀、王莽时，“洛阳张长叔、薛子仲訾亦十千万。”^⑭

桥桃“以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粟以万锺计。”^⑮

吴楚兵起时，毋盐氏出捐千金贷，其息十之。三月，吴楚平。一岁之中，则毋盐氏息十倍，因此富关中。”^⑯

关中富商大贾大都是田氏家族。“田墙、田兰。韦家栗氏，安陵杜氏亦巨万。前富者既衰，自元、成迄王莽，京师富人杜陵樊嘉、茂陵挚网、平陵如氏、直氏，长安丹王君房，豉樊少翁，王孙大卿、为天下高訾。樊嘉五千万，其余皆巨万矣。王孙卿以财养士，与雄桀交，王莽以为京司市师，汉司东市令也。”^⑰

上列材料可以说明三个问题：

其一，西汉的商贾从汉初到新莽时期都顽强地存在着，每个时期都可以列举出其代表人物，其分布的地域也较广泛。

其二，西汉的商贾经营的范围甚广，有的经商，有的放高利贷，还经营农业，畜牧业、矿冶、渔盐等各个方面。

其三，商贾的资本雄厚，经济实力都比较强大，除了上所列者，其他“兼业专利，以货赂自行，取重于乡里者，不可胜数。”^⑱

为了进一步考察西汉商贾的经济实力，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究竟处于一种什么地位？我们将其与同期的“列侯封君”、“编户齐民”进行比较。

当时的列侯封君“食租税，岁率户二百，千户之君则二十万，朝觐聘享出其中。庶民农工商贾，率亦岁万息二千，百万之家即二十万，而更繇租赋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陆地牧马二千蹄，牛蹄角千，千足羊，泽中千足彘，水居千石鱼陂，山居千章之材。安邑千树枣，燕、秦千树栗；蜀、汉、江陵千树橘，淮北，常山已南，河济之间千树萩；陈、夏千亩漆；齐、鲁千亩桑麻；渭川千亩竹；及名国万家之城，带郭千亩亩钟之田，若千亩卮茜，千畦姜韭：此其人皆与千户侯等。”^⑲当时即有人称：“仕不至二千石，贾不至千万，安可比人乎？”^⑳可见当时商品范围之广泛，商贾实力可以与千户侯相比，与二千石相提并论，有“素封”之谓。

文帝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㉑这与家“数千金”、“五千万”、“十千万”，童仆无数者相比，应当是当时“编户齐民”之中产者的数十至数百倍。司马迁言到其“皆非有爵邑奉禄弄法犯姦而富”，是当时的封建政策所许可的。“若致力农畜、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都，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者，不可胜数。”^㉒故有“千金之子，不死于市”之说。这就意味着，在商贾强大的经济实力面前，

编户齐民不敢仰而望之，列侯封君黯然失色，就连封建法律也开始丧失威力，这些都是历代所罕见的。

深刻的社会影响

西汉一代商贾势力的崛起，当起于汉初的“复弛商贾之律”。虽然各个朝代的政策有宽有严，有惠有抑，但他们不仅在经济上拥有实力，而且在社会各个方面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表现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政治上顽强的自我表现，渐涉封建统治阶层。西汉商贾的强大经济实力甚至可以与封建王权分庭抗礼。为了笼络西汉的商贾势力，文帝时“募民能输及转粟于边者拜爵，爵得至大庶长。”^②（案，第十八级，仅次于侯。）此时爵位虽不及秦时显荣，但说明封建王权与商贾势力之间的第一次交易。武帝时，“财赂消耗而不澹”，“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夷，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而始。”^③官吏则“多用贾人，吏道杂矣。”商贾不仅拥有政治上的荣誉，而且开始拥有政治上的权力，逐渐挤入封建统治阶级。

例如文帝时所佞幸的邓通，“蜀郡南安人，以濯船为黄头郎。”赐通蜀严道铜山，得自铸钱。邓氏钱布天下，其富如此。并官至上大夫。^④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为事，入山牧十余岁，羊致千余头，广买田宅，曾官至齐王太傅，御史大夫之要职。

东郭咸阳，“齐之大煮盐”；孔仅，“南阳大冶”，武帝任之为大农丞，位列九卿，负责当时财政的重要命脉，“领盐铁事”。^⑤

王莽时王孙卿被任命为京司市郎，汉司东市仓也。

尤为显贵的是桑弘羊，“洛阳贾人子，以心计，年十三为侍中。”先后任大农丞，搜粟都尉，御史大夫等要职，参预机要，从政达六十年，为武帝设计了大规模的财政改革，时人称孔仅，咸阳及桑弘羊三人“言利事，析秋毫矣”。武帝去世前擢升为御史大夫，与霍光、金日磾、上官桀等，“受遗诏辅少主”，权倾朝野^⑥。武帝还“使孔仅、东郭咸阳乘傅举行天下盐铁，作官府，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吏道益杂，不选，而多贾人矣。”^⑦商贾参政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市井子孙不仅可以做官，而且能参预机要，影响朝廷的经济命脉，成为一股令人畏惧的社会力量。

二，商贾地位的提高产生了人际关系的变化。经济基础发生的变化必然反映在上层建筑以及人们思想意识之中。昔日的“七科谪”、“贱商人”重压下的齷齪渐成过去，其“倾都”、“倾县”、“倾乡里”的地位也反映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西汉商贾，“千里游遨，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縠。”“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⑧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益，或至兼并之徒，以武断于乡曲，成为地方上的一霸。“比一都之君”，甚至“与王者同乐”。其原因究竟是什么呢？司马迁一言道破天机：“故富，而主上重之。”炙手可热的经济实力，竟使专制主义集权的西汉社会在人与人的关系上产生了如此微妙的变化，财富多少亦成为尊卑的标志。“凡编户齐民，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⑨西汉的富商大贾“除贷郡国，人莫敢欺。”而“列侯封君齐贷子

钱。”拥有高贵血统的列侯封君也要对昔日所不耻者“俯首仰给”，甚至互相勾结，形成了西汉中后期官僚、地主、商人的结合，是东汉豪强地主的滥觞。

人们思想观念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一些人抛弃了传统的“礼教”而背本趋末，即“多去文学而趋利”，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求富热潮。他们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俱欲者也。故壮士从军，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理，劫人作姦，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⑩一些贫人皆“学事富家”，一些读书人则“去文学而趋利”。时俗称：“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社会上对商贾的羡慕和追求其最本质的即是“财”和“利”，极大地冲击了封闭形的封建自然经济思想，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上的变化，五颜六色的社会现象也产生了。

三，“求富”热潮的形成与“治富”学问的总结。

商贾势力的强大存在引起了人们开始总结出一套经商求富、致富、守富的哲学。

第一必须有心计，善权谋。总结出了“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⑪经商当“犹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也。”要智能权变，勇于决断，仁以取予，强有所守。^⑫

第二要充分掌握市场信息。即“善治生者，能择人而任时。”^⑬在激烈的商品竞争中应当知道：“富无经业，货无常主；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故应当“乐观时变”，“人弃我取，人取我予。”^⑭掌握诸如“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采”^⑮这样的基本经验。

第三，必须吃大苦、耐大劳，忍常人所不能忍。要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童仆同乐，趋时若猛兽鸷鸟之发。”^⑯同时亦要很好地掌握节奏，“无财，作力；少有，斗智；既饶，争时。此其大经也。”^⑰

第四以“末”求富，以“本”守之。经商是治富的重要手段。故有“以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绣文不如倚市门。”但又应该“以末治富，以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变化有概，故足术也。”^⑱致使相当多的西汉商人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面对变化无常的封建政权，致富后立即将过剩资本转入到土地上去（作者案：兹不展开，这也是西汉商贾势力不能引起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原因之一），而逐渐又纳入了封建经济的怪圈内。

综上所述，西汉商贾及其深刻的社会影响开始反映在封建正史之中，《史》、《汉》对其作了重要的总结。昭帝时桓宽针对当时西汉中央政府争论的重大利益——盐铁问题而作的《盐铁论》，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边防各方面的问题。这些典籍的出现，无不显示出商贾势力对西汉社会的重大影响。

矛盾的商贾政策

商业活动是社会历史进行第三次大分工的产物。《周书》曰：“农不出则乏其食，工不出则乏其事，商不出则三宝绝，虞不出则财匱少，此四者，民所以衣食之原也。”^⑲商贾对封建经济是具有强大活力的；同时，其在封建经济与政治上的分裂主义倾向又是统治者所时刻警惕的。诸如历史上的“重农抑商”、“强本抑末”、“贱商人”、“七科谪”等，这些传统观念极大地影响着西汉的商贾政策。

商贾势力的发展是与经济发展息息相关的。马克思说：“在中世纪，乡村本身是历史的

出发点，历史的进一步发展，后来便在城市和乡村对立的状态中进行。”^④建立在“通”的基础上的开放性的商品经济，则与中央专制集权的封闭性的自然经济始终存在着严重的对立，这一矛盾贯穿整个西汉历史，构成了其商贾政策的基础。西汉王朝既看到了商贾势力对封建经济的活力，对巩固封建统治的重要作用，同时又警惕其政治、经济上的分裂主义倾向，这是危及封建专制的一股力量。从维护封建专制的根本利益出发，他们实行的基本上是“重农抑商”的政策。但为了经济的发展，为了维护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他们对商贾又在不同时期采取了灵活变化，诸如“惠商”、“宽商”政策，故又显示出其极大的矛盾性，其政策特点今综述于后。

第一，限制发展，“重租税以困辱之”：

“重农抑商”是西汉王朝的基本国策，对商贾的分裂主义倾向是非常警惕的。高祖时期，由于“不轨逐利之民，蓄积余业以稽市场，物踊腾耀，米至石万钱，马一匹则百金。”^⑤而商贾“财或累万金，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故汉高祖在恢复生产同时，“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⑥即不仅从经济上打击，而且也从政治上打击。孝惠、高后时期规定“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⑦文帝时的“铸钱之禁”。武帝时商贾势力虽然有强大的发展，但是武帝以统一币制，均输平准，总一盐铁，算缗告缗，以“不得名田”等严刑酷法予以沉重打击，与商贾“争利”，“以摧浮淫兼并之徒”。^⑧昭、宣、元、成、哀、平等世也都根据重农抑商的原则来制定政策。虽时有变化，但一旦商贾势力影响了封建王权的安危，或其分裂主义的倾向有所抬头，西汉王朝则利用手中的行政措施，一次更大的打击也就随之而来。

第二，利用其“分财布利”、“通财鬻货”的功能刺激封建经济发展：

商贾对生产的刺激作用是明显的。“孝惠、高后，天下初定，复弛商贾之律。”故得“衣食滋殖。”文帝、景帝时进一步“开关梁，弛山泽之禁”，以及“入粟拜爵”并“得以除罪”的惠商政策，利用免征关税的政策导向，使“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的客观作用调节了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的经济关系，使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使“富商大贾周游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根据史书记载，不仅有中原地区贸易，边疆的民族贸易、海外贸易也得到兴起与发展。武帝在打击商贾的同时又进一步地发展了惠商政策，商贾不仅在经济上拥有实力，而且可以“补官”，一些商贾不仅拥有政治上的荣誉，同时也有了政治上的权力，在封建专制中分得一杯残羹。

第三，因势利导，鼓励“善富”：

西汉统治者认为：“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择也。”^⑨如何因势利导，把西汉商贾纳入封建经济的正轨，是他们处心积虑思考的问题。《史记·货殖列传》对其作概括性的叙述：“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因之”、“利道之”、“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即说明应区别不同情况，该打击的坚决打击，该旌表的予以旌表。

西汉政府对商贾“因势利导”的核心是鼓励“善富”、打击“姦富”。《史记·货殖列

传》进一步地解释：“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适其力。”①颜师古更是在《汉书·货殖传》注释说：“折节力田，务于本业，先公后私，率导闾里，故云善富。”其“善富”的标准则是以其是否维护封建主权，是否符合重农抑商之原则。

为了率导百姓，西汉政府还树立了一批善富的榜样。宣曲任氏，“富人争奢侈，而任氏折节为俭，力田畜。”而“公事不毕则身不得饮酒肉，以此为率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②大商人卜式，《史记》、《汉书》均对其作了详细记载：“是时，豪富争匿其财，唯卜式数入财以助县官。”③西汉王朝“拜式为中郎，赐爵左庶长，田一顷，布告天下，尊显以风百姓。”以后“上以式朴忠，拜为齐王太傅，转为相。”④司马迁还为“当世千里之中，贤人所以富者，令后世得以观择焉！”而作了《货殖列传》，并且一再声称：“此其章章尤异者也，皆非有爵邑奉禄玩法犯姦而富……”

综上所述，商贾经过夏、商、周三代的兴起、发展，特别是春秋、战国有了长足的进步。西汉富商大贾之多，商业资本之雄厚，商品范围之广泛，“用事童仆”数量之大，市场之繁荣，都是历史上任何朝代所不能比拟的。

西汉商贾有普通商人、工商业商人、政治商人三种，其以工商兼营的商人影响较大，是当时商业资本汇集的地方，而且集中于对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冶铁、煮盐和铸钱三大产业。如果不是封建王权的强烈压制，是可能向资本经营的形式发展的。

西汉商贾努力的强大已强烈地影响到社会各个方面，拟于“一国之君”，连郡国、政府都要向其借贷，人们对其蹶足侧目。由于其经济地位的提高，西汉政府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如废弛商贾之律，开关梁，弛山泽之禁，入粟拜爵，除罪，甚至入粟拜官。而普通百姓也逐渐改变观念，多去文学而趋利，掀起了整个社会的“求富”热潮。流风所被，波及封建王公贵族，如吴王刘濞等亦参加其中。

西汉政府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封建自然经济的前提出发，从而制定了“重农抑商”这一基本国策，面对强大的商贾势力又不得不作一些妥协，采取了表面上似乎矛盾的政策，既利用、又限制，既宽又抑；用鼓励“善富”的政策过行“风喻”；用严刑酷法予以打击。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业……”⑤实际上把方兴未艾的商贾和商业资本纳入到封建经济的怪圈内，重新投入到封建土地上去，为东汉的豪强地主兴起创造了条件，形成了束缚中国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桎梏。

掩卷长思。西汉的商贾势力是空前发展的，一部二十四史中只给西汉一代的商贾立传。西汉的商贾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封建经济的发展，但从历史发展的观点来考察，它却阻碍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产生，给历史留下了无穷的遗憾。

注释：

①《世本·作篇》。

②《易·系辞》。

③④⑤⑥⑦⑧⑨⑩《汉书·食货志》。

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

④⑤⑥⑦⑧《史记·货殖列传》。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汉书·货殖传》。

⑩《汉书·酷吏传》。

②《汉书·文帝纪》。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史记·平准书》。

㉞《汉书·佞幸传》。

㉟《盐铁论·通有》。

④马克思《资本主义生产以前各形态》，1956年版

第15页。

⑩《汉书·公孙弘卜式儿宽传》。